

必修课

□纪红建

从南京转乘动车到扬州,已经晚上9点多多了。没有在网上预订宾馆,更没有一下车就急于找宾馆,而是直接打的赶往运河边。我的每一次行走都是朝圣,更何况扬州之旅。司机把我带到东水门,那是大运河的拐角,90度,既可看到她东来的面容,也可欣赏她南去的背影。沿着两岸成荫的绿树,秀美的灯光,我向辉煌灿烂的唐代扬州走去。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啊,她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瑰宝。她承载了太多太多,也是她孕育了国际化大都市扬州。没有扬州,我家乡那些大胆创新、勇于冒险的唐朝先民就无法把长沙窑的精美瓷器,从湘江起航进入洞庭湖,经过长江和运河,销往全国各地,更不可能乘风破浪,到达东南亚、波斯湾、红海一带,走向世界。沿着运河北岸小道朝东走,一直走到没有了灯光,也没有了喧哗,但听到了大运河心跳的声音。

是的,我正在探寻长沙彩瓷走向世界艰辛而又辉煌的道路,探秘中国彩瓷文明远航的历程。

与大运河亲密接触时,同事在帮我分担工作,妻子在独自承担家庭重任。行走,成了这10多年来的常态。正如同事姜成所说,纪红建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从选择报告文学的那天起,我就选择了行走,并且从未轻易回头。我深知,行走永远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必修课。

10多年前,因为写了《哑巴红军》,被《中国作家》高度关注,并不知不觉走上了报告文学之路。当年,何建明老师微笑着对我说,干报告文学是个苦活,但很有意义,欢迎你加入这个队伍。爱酒更惜才的萧立军老师见我必说,小纪呀,一定要记住,报告文学六分采访四分写作,没有扎实的采访,就很难写出优秀的报告文学。随后的日子,《中国作家》既像慈母亦像严父,一直鼓励鞭策着我在报告文学道路上前行。

行走,自然孤独,也必须孤独,在孤独中方能远行,才能吸收丰厚的营养,才能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些年,我走过红军长征路、“西气东输”“中亚天然气管道”“南水北调”,探访过沂蒙革命老区、湘西革命老区、台湾抗日遗址,有时在色彩斑斓的现实中穿梭,有时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徘徊,感受着温度、力量与博爱。

《乡村国是》的采写是从2014年底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我走访了14个省39个县的202个村,都是深度贫困地区。在辽阔的大地行走,我深深体味着“贫困”二字的宽广与无限,贫困地区群众自强不息、坚毅与顽强的意志与精神;各级扶贫干部,各行业各领域的扶贫力量的

无私奉献精神……当我来到被大山包围的广西凌云县泗城镇陇雅村陡堆屯,看到村口石碑上刻着“为了生存,永不放弃”这8个苍劲而沧桑的朱红大字时,不由心里一震,这是中国贫困群体与铁面无私、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搏斗的誓言啊!

太多的细节感染着我。2016年夏的一天,我从贵州晴隆县下乡采访回到县城已是晚上6点多了,但因为第二天约好到罗甸采访,我必须连夜赶往贵阳,第二天一早转车。到汽车站时,长途客车已停运。就在我失望地离开汽车站时,一个女子把我带到附近的小巷子,坐上一辆7座共挤坐17人的小商务车。晚上10点多,车子在贵阳金阳客运站北边的绕城高速停下,我在路边下了车。正当我准备翻过围栏,走下高速路时,发现手里少了一样东西——笔记本电脑。我连忙回头,但车已消失在夜色中。笔记本电脑一直是我的重点保护对象,虽然每采访完一个人,我都会把采访资料备份在U盘中,但现在关键是,不论是笔记本电脑,还是U盘和录音笔,都放在电脑包里。可我没有司机的电话呀!我瘫坐在路边……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手机响了。是黔西南州的号码,我既惊喜又担忧。是个女子打来的电话,对,就是拉我上车的那个女子。半个小时后,那个女子从商务车上下来,手里提着我那个笔记本电脑。我拿出200块钱表示感谢。那女子淡然一笑说,要什么钱,只要你没少东西就好。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只是淡然一笑说,我是晴隆的。望着消失在夜色中的商务车,晴隆那片充满温情的土地又浮现在我眼前,泪水湿润了我的双眼……

有时也会想家,甚至刚出门两天,就觉得岁月漫长。我有最好的朋友——书呀,带着它,心灵便有了依靠,行走也更加自信。一路上,《乡土中国》《瓦尔登湖》等都曾滋润着我孤独的心灵。

写作也可抚慰心灵!在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定西、河西一带行走的两个多月里,我白天采访,晚上创作另一部先前采访完毕的作品。定西是我在“西”地区的最后一站,离开定西的前一天晚上,我写下长篇报告文学《马桑树儿搭灯台》的尾声。真要感谢行走给予我能量,赐予我灵感。

……

思绪该回到扬州,回到运河边了,因为我在大运河边的一个小宾馆住下了,躺在了她温暖的怀抱中。

我拿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扬州城地图,开始谋划第二天的寻访。

■印象

湖南人的精神

□丁晓平

和纪红建第一次见面,是2012年在华西村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交流会上。那是我第一次以作家身份参加全国文学创作会议。接到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的邀请时,我感到十分诧异,内心不免还有些兴奋。我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题目是《宽容·局限·叙述——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的三个关键词》。会间休息时,只见一个个头不高、皮肤黝黑、额头宽广、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年轻人从会场的另一侧向我跑过来,憨憨地微笑着与我握手,轻声细语地作了自我介绍。原以为的孤陋寡闻,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毛泽东文学院,我也记住了纪红建这个名字。

和纪红建第二次见面,是2013年夏天。他到北京来了,在鲁迅文学院上学。说句实话,那时候,我对鲁院是陌生的,没有任何概念。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和同事们要在那里举办一个以“责任和担当”为主题的“当代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困惑与追求专题研讨会”,许多大咖都要去,也邀请我去。我答应了,作了题为《论作家的“气”和“度”——从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担当”谈起》的发言。对我的发言,红建又是点赞鼓励,谦虚可爱的样子让我不知怎么回答他才是。

和纪红建第三次见面,是2014年的秋天。没想到,我也上了鲁院,成了他的师弟。他是鲁二十,我是鲁二十四。鲁二十四是中国作协专门在鲁院举办的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高级研修班。何建明先生来授课时提出要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成立青年创作委员会,这是一个创新,也是全国第一个旨在培养、发现和凝聚青年作家力量的平台。在他的指导下,我牵头负责具体工作。就这样,红建来北京参加了成立大会,成为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之一。从此,我们成了相知相印、不离不弃的兄弟。因为都是当兵的人,我们之间平添了无言的战友情义。

红建属马,比我小7岁。但在做人做事上,要比我成熟得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成立后,在何建明会长和学会领导的指导、关心和支持下,从2015年开始每年上半年都要举办中国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论坛,先后在北京、韶山、正定举办了三届,在各界反响甚好。其间,红建做了大量幕后工作,给了我巨大帮助和支持。他的诚恳、踏实、严谨、周到、热忱、善良,成为我一直存心间的美好记忆。

7年来,我和红建每年至少都要见上一面。2018年5月,我们有幸在鲁院相逢,成为当代现实题材创作作家高级研修班的同学。半个月时间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有话多说,无话少说,或相对无言,默契如灵犀,温暖在心间。也就在这一年,红建以凝聚他心血和体温的著作《乡村国是》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实至名归,一时

间成为家乡湖南文学界的盛典,也赢得了几乎所有报告文学作家朋友们的掌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自然与他的文品和人品有关。高调做人,低调做事。出生在雷锋家乡望城的红建,因此也收获了湖南文坛雷锋的赞誉。

《乡村国是》出版后,红建来京时赠我一册,因为懒惰,我没有为他写点什么。我知道他著作等身,获奖无数,可我没有时间对他做深度的研究,因此心中总感觉欠了红建什么似的。因此,在写作此文时,我才发现红建竟然是我最熟悉的那个“陌生人”。于是,我花了一周时间,认真阅读红建给我发来的作品、评论、访谈,心灵震撼了,眼睛湿润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在《乡村国是》采访的路上,红建曾两次落泪。一次是在贵州晴隆,他不慎将采访本、笔记本电脑和录音笔落在了“黑车”上,那里装着他两年来辗转全国200多个乡村的汗水,孤独无依的他站在贵阳的星空下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幸亏“黑车”女售票员是一个善良的好人,主动联系上他,完璧归赵。另一次落泪,是在2016年结束银川的采访,在踏上归途的大巴上,看着车窗外广袤辽阔的黄土高原,他忽然想到“这么大的件事,居然让我给忘了”,忍不住泪洒满面。读到这里,我也情不自禁地落泪,我知道那是红建的泪水打湿了我的键盘。我读懂了你,红建!

从农村走出来的红建,不容易!从军营走出来的红建,好样的!湖南作家欧阳伟在《不用想的颁奖词》中这样评价红建:“看不出,他出道那么早,起点那么高,却这么低调;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儿子,骨子里刻着四个字:老实肯干!他是作家中的劳模,勤奋是他的底色,坚守是他的情怀。”这三句话,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从此我敢说,红建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陌生人”了。

我的同乡陈独秀早在1920年写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称赞王船山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称赞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的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称赞黄兴、蔡锷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现在,我从红建成长、成才、成功的道路上,也看到了陈独秀先生所称赞的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红建在报告文学事业上的播种、耕耘与收获,与湖南人的这种奋斗精神是分不开的,是根植于那一方水土的基因和血脉的传承。在我工作单位马路的对面,有人在门口悬挂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对联。我知道,它复制于长沙岳麓书院。每天经过时,我都会有意无意地抬头看上一眼,自然也会想起长沙城里的红建,心中悄悄的想念就才成了默默的祝福。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诚哉斯言!祝福红建,祝福和他一起奋斗在报告文学道路上的湖南的朋友们!

现实书写与历史回望——论纪红建的报告文学

□黄菲蒂

2018年,刚届不惑的纪红建以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一书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位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带着脚上的泥土和书中的文字进入了学界和大众的视野。2006年,他的第一个作品《哑巴红军传奇》在《中国作家》发表,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从那时起,纪红建就选准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持续以报告文学发声,至今已出版10余部长篇。他走进莽莽群山,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鲜活的历史故事,在《见证》中呈现革命者的身影;他把眼光投向特殊人群,讲述他们的苦难和艰辛,写就《不孕不育者调查》;他书写湖湘革命历史,在《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中展现了一个血性又深情的湘西;他怀抱祖国当下,在《乡村国是》中礼赞脱贫攻坚的伟业。他在大历史大时代的雄壮激越里挥毫泼墨,也沉潜民间,把小人物的故事讲得血肉丰满。在报告文学文体面对质疑时,他用实际行动一次次交出答卷,把行走得来的珍贵材料凝聚成有生命温度的文字,以此来证明纪实价值。

我们在聚焦作家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到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报告文学自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历史的百年进程,在重要的历史和时代节点上,从未缺席,甚至多次成为时代的文学主潮。它与历史和时代之间的紧密联系是由其文体本性决定的,相对于其他文学样式而言,报告文学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显示着“诗史互证”的文体价值。纪红建的写作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文体价值的自觉践行。

时代精神与作家在场

我们身处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神州大地上每天发生的国家和人民故事的总和共同构成了最宏大壮丽也最细微生动的中国故事。大量关注现实、记录时代、反映民生的报告文学作品涌现出来。在贴近现实的写作上,与其说是作家选择了报告文学,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报告文学。

《乡村国是》就是一次时代大主题的书写。作者把目光聚焦于贫困山区,把扶贫攻坚、精准扶贫、扶贫干部和受益于这一政策的地方及百姓纳入写作视野,写的是新时代中国扶贫攻坚脱困致富的新风貌。“纪红建的《乡村国是》从遍及十多个省市,202个村庄的深入行走中,获得总体性视野和生动具体的经验,充分表现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历史性成就和千百万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在这份鲁奖评委会颁奖词中我们读到了作品的主题,也看到了作者忠实诚恳的写作态度,

以及报告文学写作的艰辛。

作者重点写了扶贫故事中的人,有精准扶贫的驻村干部,有带领群众艰苦脱贫的老党员、老干部,还有深度贫困地区不甘贫困、敢于战胜贫困的百姓。那些带领群众脱贫、无私奉献的基层干部和一身能力与担当的地方能人是最令人尊敬和敬佩的。这其中有“为了生存,永不放弃”的广西男子汉吴天来,有“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巴中男子余定泗,有“攒劲的小伙子”陈银和他的儿子陈泽恩。作者饱含深情的文字是对他们的忠实记录,更是心中的无限敬意。作者在展示变迁中的乡村,也写出恒久不变的乡土人情:“十八湾老百姓没什么见识,但民心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讲义气,讲感情”;老伴儿和儿子都去世了的龙凤仙老人说自己是党员,坚持出工修路,否则内心惭愧。“礼失求诸野”,顽强的生存意志、善良、奉献、牺牲的高贵人性在这些贫困的土地人身上闪光。作者说写得带着“温度”的扶贫报告,这温度是不甘贫困、战胜贫困的意志,也是真挚的情感温度。

如果一件事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能表达民间声音,那一定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精准扶贫”即是这样一件家国盛事。纪红建以知识分子之笔赞颂了精准扶贫政策的伟大实绩,又传达了百姓真实的感激之心。主流政治话语与民间立场在作品里得到了真实可信的自然融合,并形成了有力的表达。高扬的理想主义听到了来自土地的回声。立场的融合让作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作品展示了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伟大功绩,也关注到这一过程的艰巨和复杂性;既记述了山区人民战胜贫困的强大意志、生存智慧和牺牲精神,也对人性的弱点做了批判与反思。作家用脚步丈量着大地,每一个字句都真实有据,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生命和品质。在一切有关农村的想象和批判面前,报告文学作家只用凝练真情真心的文字默默回答,深沉稳重,如山如海。而这一切早已超越了扶贫的范畴,走向文化的深处,给当下乡村书写和乡村建设提供了精神、情感和思想上的某种经验。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写作视野扩展到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教育发展、文化建设之上,使作品整体上显示了写作的广度与深度。《乡村国是》是一次真正为国为民的书写,是用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体现报告文学精神向度的有力实践。我们似乎看到了五四文学“为人生”而写作的文学理想。作品也恰如学者丁晓原所说:“《乡村国是》所写的中国农村扶贫脱困的实景,呈现的正是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作品本身的厚重,

担当得起这样一个‘国是’书写的题材。”

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就决定了其创作本身的价值。同样,《发现龙门山》(与李鸣生合著)是一部对龙门山的自然、人文、历史、现实,以及农民的存在状况、艰辛、坚韧、追求、梦想的田野调查报告。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既可安然于奇山异水,平凡生活,也能在5·12大地震这样的灾难面前发出顽强的生命意志,迎难而上,重建家园。作者说:“龙门山的人天生写就了一部作品,只需与他们更近距离的接触,体味他们的生活与喜怒哀乐,然后用文字加以记述,便是最好的作品。我想,这也让文学回到了生活,让文学重归龙门山那片土地。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就是作品。”让土地和生活本身说话,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在报告文学中的重要体现方式。

作者在宏大题材写作时,也把笔触伸向普通的人生。《母爱最真》的主人公任菲莉是一对双胞胎脑瘫姐妹的母亲,她对孩子不离不弃,与传统观念和歧视眼光作斗争,用自信和母爱为孩子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让孩子逐步实现着身体的站立、人格的站立、精神的站立。中国女性自尊、自爱、沉勇坚毅的品格深刻地体现在这位伟大的母亲身上。我们在众多新闻中多次看到了主人公的故事,但在这个作品中看到了这位母亲故事背后的真实人生。这正是,报告文学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出发。

革命历史与史志书写

纪红建是在部队成长起来的作家,对中国革命和战争英雄有着最真切的情感,他有着与生俱来的爱与责任来书写这段历史的苦难与辉煌。我们评价一部作品的“当代性”是否鲜明或深刻,则是在讨论作者是否能够意识到历史的深度,是否以恰当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历史深刻性。不管是关于历史的叙事还是现实的表现,都是身处当下的人所意识到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克罗齐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些深入历史的写作,既要回到历史现场,也应映照时代主题。在红色历史题材的写作中,我们既回到历史现场,也在当代寻找精神血性。

《马桑树儿搭灯台》是一个兼具文学性和史志性的可贵文本。这是一次始于寻找的历史写作。作者从寻找一位唱湘西桑植民歌的老者开始,走进血色湘西,讲述那些深藏土地的英雄往事。作者在故事里写人,着意写出这些普通乡民的独特性和他们的平凡面目。他们像马桑树儿一样,不

是伟岸栋梁之才,但可沤肥,可入药;“算不得伟大,但生命力强,不容易死,这世界少了它也是不行的”。大历史在他们身上投下印记,一个个普通人的传奇合成为一个革命历史的图景。但这恰恰是中国革命波澜壮阔背后最坚实的又最安静的生之力量,是浩荡历史长河中永远鲜活活动的中国故事。我们从这些故事里读懂一段历史的意义,继而找寻到今天我们再出发的原点和动力。作者选择用战争亲历者的口述来进入战争现场,在这样的惨烈面前无法抒情,此时,纪实是文学致敬英雄、鞭挞丑恶的最好方式。不是任何事物都适合进行诗化化的表现的,所以,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作者给予他们充分表达的权利,大量生活琐事和方言俚语渗入其间,故事的讲述因而生动。直击真相体现着纪实创作的情感态度与力度,探寻人物和故事生长的历史文化土壤则考验着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此民歌与人们精神气质的内在契合。民歌浓缩着的是一个民族和地域的生存史、情感史、精神史和心灵史,湘西北人民性格如山一般“安于义理,厚重不迁”。作者深知这才是托举人物和故事的厚重底子,于是他从抗战故事的记录逐渐走向这片湘楚文化的内在肌理,有意识地突破简单表现生活的维度,以理性和自觉来认知和发现历史生活的复杂性,他意识到必须要重读湘西,写出这里被长期遮蔽的一面。

《哑巴红军》是纪红建的第一个报告文学作品,这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文本。一个姓名和出生年月不详的聋哑人参加了工农红军,登记的名字是哑巴同志,这个伴随一生的称呼因其人格的高尚而成为一个精神符号。他天聋地哑、脾气暴躁、善用唾沫表达自己的不满、手紧、爱闹点小别扭……但他有着常人难有的意志品质,他不畏强暴,不惧死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他省吃俭用,资助战友;看管果园的时候,给幼儿园孩子们送果子吃,捡回来的果子中好的给战友,自己吃腐烂的;他孤身一人,把爱都给了国家和他人……这让人想起雨果笔下心灵至美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和电影中那个执著善良的阿甘,他们都是以高大美好的人格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赢得了自己的人生。《见证》是一部及时抢救中国农村红色革命历史、记录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生平事迹的可贵作品。在祖国的农村生活着一群被誉为“红色群落”的农民,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老党员,平均年龄80有余。战争年代,他们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和平年代,他们躬耕田间,坚守信仰。随着他们的逝

去,一段革命历史也将逐渐远去,两位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题材的重要和紧迫性,就此深入沂蒙革命老区,挖掘这一“红色群落”的先进事迹,以展现共产党人的精神本色和信仰之义。近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这就特别需要我们的作家拿起笔来,严肃对待历史,严谨书写革命往事,带给读者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文学读本,彰显文化自信。《不朽残碑》则讲述了芷江受降纪念馆恢复重建的一段往事。作品在芷江受降的历史和恢复重建的现实之间双线叙事,在历史史实的严密中借鉴小说笔法,情节紧凑,作品读来严肃活泼,历史和现实前后贯穿,一部芷江受降的生动书写由此跃然纸上。在历史中寻找是我们的初衷,从伟大的历史精神中出发才是作品的目的,作品因此有了历史感,历史也有了当代性,这是作家历史写作最大的价值所在。

评论家谢有顺曾经写到:“今天的作家,普遍耽于幻想,热衷虚构,惟独不会看,不会听,不会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写作,而从来没有想过,作家有时也是要用耳朵写作、用鼻子写作、用眼睛写作的。他们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有心肠。”而报告文学作家就是我们需要的用心肠写作的一群人,纪红建说:“要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品,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坚持用‘脚步’写作。这是一名作家高度自觉参与的表现,更是勇气与毅力、道义与良知、责任与担当的充分表达。这是作家身心的投入,是对内在激情的唤起,更是精神的行走。”一方面他走进现场获得第一手写作素材,一方面拷问细节真实,做到字字有出处。“做一名记录者、思考者、报告者,做人民心声的传递者,这一点,在我心中从未动摇过。”

他自觉践行着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身上体现着脚踏实地、霸蛮吃苦的湘人性格。面对大主题和小题材能得体把握,在历史和当代性之间自觉融合,文本践行着报告文学“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文体担当,持之以恒的努力最终合成丰硕的创作实绩。不是在写作,就是在采访的路上,已成为这位年轻鲁奖获得者的生活常态。他走在盛大的时代中,也跋涉在寂寞的山野里,我们祝福纪红建行走的步伐更加稳健、从容。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